



《马桥词典》：反现代性书写中的民族寓言

许馨元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韩少功于1996年在《上海杂志》发表的《马桥词典》是一部独特的词典体小说。作家在以词典编纂人“我”为叙事者,营构湖南村马桥这个多元性的虚拟边缘空间时,采取了反现代性的叙事立场,着意打乱现代性统摄下的线性时间进程,在重新审视马桥的神秘主义信仰和封闭的乡村文化的过程中破除了“先进/落后”“新/旧”二元对立的现代性思维,于其间探寻非官方的隐形历史,展现了另类生命之间的差异性和无限的活力。这股不容忽视的反现代力量在作者的理性审视中又反哺了正在寻求发展的现代文明,最终指向为一种朦胧的民族寓言。

关键词:马桥词典;边缘空间;反现代性;民族寓言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4)02-0059-06

自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以来,对于“现代性”的探讨便成为了作家们重要的创作主旨。在启蒙现代性主导的科学理性、自由民主等观念的指引下,中国的乡村文明、神秘主义文明与古朴的思维模式等被视作传统、陈旧的历史遗留物而屡遭批判和舍弃。然而,“自1917年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之日起,它就和现代性、反现代性纠缠在一起。单纯地强调一方面,都不足以较完整地把握现代文学的价值立场”^[1]。反现代性立场不仅可以作为现代性立场的补充,更因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后发外生”的特质而能够适时地以逆向姿态,使现代性迅猛发展之下产生的一系列症候浮现于地表。

事实上,反现代性立场在很早以前便初露端倪。从鲁迅的创作开始,便已奠定了反现代性与现代性的双重面向。在《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作品中,鲁迅尖锐地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了冷嘲热讽,彰显了以“立人”为目的的现代性目标;而在“五四”知识分子们高唱启蒙赞歌之时,他却能够在小说《伤逝》《在酒楼上》、杂文《娜拉走后怎样》等文章中以反现代性书写揭示启蒙现代性背后存在的一系列关乎“未来”的问题。因此,鲁迅对待现代性的辩证立场以及对人之为“中间物”的观点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宝贵的思想资源;而在废名、沈从文等作家的小说当中,传统的乡村从继承“落后”基因的肮脏之地,化身为了作家想象下的乌托邦,其美妙、安宁与和谐的

氛围使得人与神、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都存在一种和谐圆融的关系,最终达到了一种“佛、禅、神”统一的境界^[2]。此类“世外桃源”也在格非的“江南三部曲”、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等作品中出现,并呈现不同的状貌,又与生态、革命等问题深刻地联系在一起。而以余华、孙甘露、残雪等为代表的先锋作家的创作,以及在苏童、莫言等人的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历史、革命、人性又以荒诞、滑稽的面目和反讽、黑色幽默的格调呈现,以抵御正在强势归来的、拥有森然秩序的现代性。正如汪树东所概括的那样,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立场,大部分情况下是出自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审美现代性、革命意识形态与超越精神这五个类型之下^[1],这五个反现代性立场背后实则隐喻着作家们对西方现代性的吸收与超越姿态。

以《西望茅草地》和《爸爸爸》等带有寻根意味和心灵伤痕的作品成名的韩少功是一个对时代与社会发展具有敏锐知觉的作家。在吸收了海德格尔等人的现代哲学思想后,他也积极在写作中开始了对独属于中国自身的现代化的探索与反思。在中国文学场域内,“城市”与“乡村”是聚焦现代性与反现代性问题的空间,因为二者既是两个重要的地理景观,又暗含着丰富的时间、政治与历史意识。但尽管韩少功选择以马桥这个边远乡村为反思起点,不同于沈从文等人笔下近乎完美的田园牧歌,作家并

收稿日期:2023-02-27

作者简介:许馨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

未停滞于守护与赞扬那一隅被现代性厌弃的乡村文明与神秘主义文明,而是采取了文化保守主义、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等复合性反现代立场,在承认其弊端的基础上揭示现代启蒙视野下被舍弃的多元、异质性的生命样态,并以此寻求现代性的新出路。

一、现代时间意识的反拨:非线性时间中的隐形历史

“现代性”是个颇有争议的概念,不同学者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从历史发展或时间的角度来看,学者普遍认为它内含着一种新的时间意识或历史观,即与传统和过去相比,现代在时间上已然占据优势,是“更为理性和进步的时代”^[3]的象征。然而作家却意在破除这种“新/旧”分明的时间神话,混淆“理性/非理性”间的界限,试图在反现代的文本建构中导向一种“置于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关系中的辩证思维”^[4]的当代性:《马桥词典》一方面采取了词典体的文体形式,使叙事呈现碎片化倾向;另一方面又在马桥人的日常生活中凸显其独特的时间认知方式,使小说整体的时间线在微小的个人和宏大的历史层面产生了结构性的差异。而“历史总体性显然有显性和隐形的两种基本形态,前者是社会强势集团掌控意识形态权力而在精神领域进行整合的结果;后者则是一个时代的思想潜在地从不同的方位无意识地形成的一种精神趋向”^[5],因此以马桥这一空间为媒介,在非线性的时间走向中,一段隐形的历史得以浮出地表。

(一) 空间化与主观化的时间思维

2016年,王建疆从社会形态和审美形态的角度提出了“时间空间化”这一概念。当“时间空间化”被用于小说叙述研究中时,其实质内涵便落实到了“时代的嵌入”意义上,即“时代”而非“时间”的空间化,并在各时代和社会形态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打破这种平衡关系,从而进入“世界历史”^[6]。《马桥词典》以“马桥”这个来源于现实、容纳了丰富的情感与历史信息的虚拟空间意象为时间的承载物,展现了马桥人独特的时间感知方式,使马桥自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作为官方历史的“他者”存在。

在马桥人的时间观念中,“空间”与“官能”是决定其如何定位“时间”的关键因素。例如,在后代马桥人的日常生活中,“荆界瓜”是一个颇为荒凉、不为人知的存在,但老一辈马桥人却不可能忘怀此地,因为这与马桥的传奇人物马文杰与属于他的“一九四八年”有着深刻的联系。一九四八年自身必然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图景,但在马桥人眼中,只有马文杰和荆界瓜的存在才能够让这个客观的年份变得鲜活

而生动;而在“马桥弓”和“老表”两个词条中可以看到,“马桥”这一地名的演变也对应着不同的时段:1956年前马桥只是马桥村,属天子乡,1956—1958年“村”已经变成了隶属东风合作社的“组”。1979年后,马桥村随着人民公社的撤销而并入双龙乡至今。“马桥”一词所附加的社会性、群体性词汇完全顺从中国当代历史的演进,因此这样的定位方式所框定的是马桥村的官方正史。但作者紧接着以马三宝这一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在方志《平绥厅志》中却变成一个贪生怕死的“癫子”的事实,发出“也许还有另一部历史”的质疑;同时,“人”的五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因此马桥人将任何食物的味道都视作“甜”的味觉盲感的背后,回应着那段刻骨铭心的贫穷时代和同样带有盲目意味的“政治味觉”。

进化论统摄下的时间法则似乎将所有的人与物都框定在了固定的秩序中不能动摇,但客观的“时间”进程在马桥人独特的感官经验中被迫进行了筛选与重组,在打破固有时间一往无前的步伐之上,又为马桥人后续得以抵抗一切外来事物和异象埋下了伏笔。

(二) 错位时间下的人间悲剧

在线性的时间路径中,青少年天然地被赋予了“进步”的象征意义,优于作为“时代落伍者”的老年人。尽管在任何一种时间观念内,个人的历史都是不能重复的,但在错位的时间序列中却更能够传达代际沟通时的无奈与痛苦。

1. 父辈的失语

在“一九四八年(续)”中,作者描写了一场发生在光复与他的娃崽之间的父子冲突:

告诉你,要不是共产党给你祖爷平反,你还想喝汽水?还想穿凉皮鞋?还想插起自来水笔上高中?你老子劳改的时候,差点连命都送了,饿得连牛粪里的稗子都拣出来吃的……”

少年气咻咻地跑到门外疯骂:“老杂种!老土匪!你这个老反革命!动不动就打人,算什么教师?”他破口大骂,“你还以为这是旧社会?你还想作威作福涂炭生灵丧权辱国吧?”他用了几个很书本化的词。“你活该!你捡牛粪吃活该!你去坐牢我还好些!我将来要当总统,也要搞运动!老子根本不给你这号家伙平反我告诉你!……”^[7]¹²⁷

“自我认同是经由自我探索以及与他人的私密关系之发展两者相结合之过程而形成的。这一过程有助于形成一种‘共享的历史’。”^[8]然而时间不是文物,光复的娃崽并不懂得一九四八年对于他的父

亲来说究竟有何意义,他只是单纯仇恨父亲对他无理的打骂和斥责,因此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之间始终隔着一名为“时间”的河流。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父与子在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中,一人站在此岸,一人站在彼岸,因而依旧无法形成一种“共享的历史”。当娃崽说出一句“你活该”时,他咒骂的不仅是父亲,还是曾经在一九八四年成为马桥大人物的爷爷马文杰的历史,因此语言汇集着无知、仇恨与缺失的时间一起攻向了光复,使身为前代人的他哑口无言。

因时间产生的区隔在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中已频繁出现。例如在王润滋的《鲁班的子孙》中,老木匠黄志亮与小木匠黄秀川之间因木匠铺产生的隔膜便与之有异曲同工之理。虽然秀川也并非完全不了解老木匠所代表的过去的岁月,但接受了异质现代文明的年轻木匠却也并未选择介于亲情去理解黄志亮的“良心”,他终究不能体会黄志亮所处贫穷时代之下那份宝贵的人情内涵。因此,“时间”的错位不仅仅是由光复曾经的凄惨处境转向娃崽如今的安逸生活这样简单,若执著于啼血般的哀泣,或以完全抛诸脑后的态度来对待一代人的前史,都会延长时间错位的悲剧,造成下一代的“失忆”。

2. 重复性的“死亡”

小说中一次又一次的死亡结局着实引人注目。在描写大部分人物时,作者以客观和理性的口吻展现了他们光怪陆离的事件与死亡方式。在这些“灵”与“肉”的死亡中不仅有意外与偶然的埋伏,更存在一种继承性的死亡;错位的时间留下了无言的遗憾,使生命的消逝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一个家庭中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中。

如小说里“台湾”词条中的茂公之死。因指令下达的时间出现了延迟,茂公阴差阳错地当上了维持会会长,又因在担任会长期间好出风头 and 贪小便宜与村人结仇,最终被本义带领的马桥群众抢走了财产,生气死。然而,茂公的儿子盐早也并未逃脱厄运。因父亲的汉奸身份,他也被冠上了“小汉奸”的称呼,又因祖娘被村人视作咒人的巫婆而遭村人排挤,最后变成了“牛哑哑”。村人将其父辈身上所背负的时间加诸在了他的身上,刻薄与冷视已使盐早遍体鳞伤。他的“百毒不侵”正象征着错位时间造成的悲剧。人称“九袋”的乞丐戴世清一生义气行事,却因“革叫花子的命”被捕入狱,在狱中苦苦哀求看守放自己出去讨饭却无人相信,最终“散发”在了监狱中。不仅九袋的时间不被官方时间所接纳,后文中他的女儿铁香生命的飘零也预示着相似

的悲剧是可以重复的。

海德格尔认为:“我们并不在本然的意义上经历他人的死亡过程,我们最多也总不过‘在傍’。”^[9]他人的死亡背后总会有“我”仍然存活的庆幸和安定,因此死亡虽然象征着个人经验与历史的完结,却无法阻拦对集体性历史的延续和“过去”对“未来”的强大影响。马桥人从不忌讳死亡,甚至有时早早死去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福气,因而这些被安排了特定死亡结局的人物极易以一种流言故事的方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彻底失去其真正的象征意义,对此文中尚未提供与其对抗的方式。时间与历史的错位以及小说中种种人物的死亡都暗示了以马桥为代表的秘史在正史面前的无力,同时也饱含作者对“正史”的无尽追问与怀疑。

二、重返“神秘”之地:淳朴生命的诗性还原

在韩少功前期的作品《爸爸爸》中,展现了所有生命都处于一种蛮荒的状态,鸡头寨古老的生活方式,只会说两个勉强称之为“词”,实则近乎失语的丙崽都充满了神秘的气息。然而这些独特的象征性意象却时刻暗示着文明的陈旧与落后,因而整体被用于揭示前现代文明之下民族失根的困境。但即使《马桥词典》选择再次进入具有“边缘”特质的神秘主义文明,身处蓬勃发展的现代化阶段的作家却从中挖掘到被淡化了对立色彩、保留了自然与神鬼信仰之韵,又于其间重申了平等意念的生命之美。这份纯然生命底蕴的存在,不仅指向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化发展的批判,更凸显了生命在无可奈何的苦难中的韧性,因而对于神秘主义这一反现代文明的再挖掘又使作家唱响了生命赞歌。

(一) 有灵万物的镜像关照

“人”与“物”的关系在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已然出现了调,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不仅无限制放大了万物自身的工具性价值,而且也使人类的“中心”意识开始以超乎想象的速度膨胀,然而马桥却保存了最原始也是最珍贵的万物有灵的意识形态,作家对这种观念的守望也充分体现了其自觉的生态观念。

首先体现在马桥与万物的积极对话上。《马桥词典》中处于萌芽状态的自然有灵观念超越了现实世界的局限,展现了马桥人对自然的敬畏,以此传递原始的中华文明的生命感知。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原始人对一切物象都打上了人格化的神灵印记,使神灵充斥人们生存的环境和空

间。”^[10]在马桥人的日常生活中,“物”不仅作为工具存在,更是作为一种贴近灵魂的陪伴而存在。例如词条“肯”在小说中本是一个情态动词,表示意愿、许可,但在马桥人口中,发出许可动作的是“物”而非人,如“这块田肯长禾”用于形容田地长势喜人。这份信念基本无须主观个人强行灌输,而是自然而然地出自于他们的集体信仰与独到的生命体悟。小说讲述了通人性、懂报复的小狗黄皮,伤了人后带着泪水被主人杀死的倔牛三毛,以及在马桥如守护神般存在的两棵枫树的故事,它们的生命在马桥充满了一种可感的主动性。

不仅如此,在马桥人与“物”的情感对话突破了“人→物”的主导关系,使“物”成为观照自身甚至产生共鸣的镜像存在的基础上,马桥人的整体精神面貌便迥然区别于患有异化症的现代城市人,而马桥人对一切人与物的“灵”的尊重也会使其得到感召。例如小说开篇第一、二个词条为“江”和“罗江”,作者以此为开端,其目的并不只停留于纯粹地理“风景”的介绍。“我”与同伴试图赖掉五分钱的过江钱,被渡江老人追赶一事,是小说中“我”在马桥的第一次受挫。但是,支付后老人找还同伴的零钱不仅凸显了这位老人的朴实,也奠定了马桥的地方人格基调;有自己脾性与习惯的两头牛也对应着其主人志煌的单纯与倔强,为后续他在会上公开反抗本义的指挥行为进行了铺垫。马桥人对自身这种朴素的生命倾向基本是无知无觉的,但却促使作为外来者的“我”以及跨越时空的作家以人文关怀的视角反观现代文明。

(二) 鬼神宿命观的正视与突破

马桥人另外的生命补偿却来自爱恨交织的鬼神生死观。中国的鬼神信仰来源众多,在马桥则偏重对道教鬼神观的吸收:“道教的广泛流行,使中国的鬼文化呈现出道巫合一,鬼、神、仙相通的特点。”^[11]“鬼”是超脱人类肉体的魂灵,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鬼”是否存在物理意义的形态也许至关重要。但在对火热的政治思想了解得囫圇吞枣,生存状况又如浮萍般飘零的贫困年代,对于马桥人来说,即使他们一面因相信巫术神鬼对人生死的无形控制而对其加以追捧,另一面又不由自主地因恐惧等情绪对其加以排斥,鬼神的存在无可避免地在人们的脑海中形成了一种顽固的文化信仰。

死后为鬼,魂魄归来在马桥成为了一种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事实。因此,人死后的状态是“飘魂”,在贫困年代人人又期待着“贵生”,但无论如何身死,肉体归于何处,灵魂都会飘荡在空中永远存

在;而在“归元(完)”词条中可以看到,马桥人的对“元”(开始)和“完”(结束)又没有任何区分,因此人的命就如同植物的根脉般无法撼动,手纹与脚纹又将仍然活着的马桥人的命运提前写进了身体里,“命”,尤其是循环式的宿命论成为了马桥人对待生与死的思维以及精神食粮。

基于马桥人循环永固的生命观,似乎每个人都无法逃离注定的苦难命运,但生命自身的无限潜力以及无意中孕育的能动性却隐藏在前世与今生的时间纠缠当中。铁香的一生之所以苦,并不仅仅在于其“低下”的阶级出身,而是无法在未满足物质条件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情感生活。三耳朵给予铁香的只是一种异样的两性情愫,却成为了铁香的情感救赎,因此她选择义无反顾地舍弃自己村干部媳妇的身份去追随一无所有的三耳朵。铁香之魂与嫂嫂的相拥与哭泣,正意味着她们身为女性被漠视的一生;在马桥人看来,复查没有因罗伯之死及时“退煞”罗伯的灵魂,故潦倒一生。但作者以神秘主义笼罩下“知识”的陷落为引,从“忏悔”这一角度分析了复查的精神困顿。“忏悔与爱实则是良知活动的一体两面,是良知意义的自我审判”^[12],神鬼的纠缠只是一种表象,作者真正想要展示的,是复查的罪感与忏悔意识中“人”的良知与底线的珍贵。

对于马桥人的神鬼信仰,“我”并未采取任何贬低或鄙夷的态度。“火焰”词条中讲到:“如果我不能提高多数马桥人的火焰,我想,我也没有理由剥夺他们梦幻的权利,没有理由妨碍他们想象他们的铁香重新返回马桥,与她嫂嫂越过生死之界在荷塘边抱头痛哭。”^{[7]24}马桥人原始思维的背后,是一座以想象力为始,终点为本真人性的桥梁,这座桥梁也许容纳不下所有人,却依旧可以成为所有人抵达生命本真的最后途径。

三、乡村文明的反观:“恶托邦”的辩证法

“韩少功的小说从题材来看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紧贴乡土、展现乡土农民生活、对乡土中国进行深度反思的农村题材;第二类是以知青为叙事主体、对知青生活的个人经验进行改写与重构的知青题材;第三类是借鉴现代主义手法营造叙事氛围的文体实验之作。”^[13]《马桥词典》结合以上三者,以笔画索引的方式,融合半叙事半议论的语言风格,描画出一幅平实的中国乡村图景。在现代性的启蒙立场之下,马桥坚定地排斥着一切异质性的存在,因而显示出了落后的基因。但在后现代视野下,马桥却拥有了排斥一切强制性认同的自守机制和反抗现

代工业文明同化的强力,并以独特的差异化方式缔造着属于“边缘”自身的传奇。

(一) 反现代姿态的客观呈现

若以现代性的启蒙视野来“观看”马桥,马桥的封闭性和排他性使其成为了具有反现代倾向的“恶托邦”,对此作者并没有刻意地进行忽略。

首先,马桥极其排斥“知识”或“科学”,作家将以马桥为代表的地方文化、边缘与底层空间放置于以“科学”为代表的城市与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展现了传统乡村文明在不断前进的时代脚步中对彼岸的恐惧、疑惑与闪躲;其次,马桥对女性有着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在马桥例如“公地(母田)”以及“月口”等词条中可以看到,女性被延伸至母性,与“地之母”的原型与图腾崇拜相呼应。但在生活中,“小哥”“同锅”“放锅”等词条却共同证明了马桥女人地位的低下:在“小哥”一词中,姐姐被称为“小哥”,妹妹被称为“小弟”,姑姑则被称为“小叔”“小伯”,即在现代汉语的男性亲属称谓前加一个“小”字,附属之意明显,证明马桥女人长期处于被剥夺“话份”的失语状态。“女性作为记忆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并非天然存在,而是取决于男性‘集体’如何接纳女性的身份建构。”^[14]女性性别本身的生育功能被格外突出和看重,但其个体意识却极易在统一的语言权力中消弭。此外,“流言”在其中也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在小说嵌套的很多故事中都有流言的身影。流言的发出者是无名无姓、面孔模糊的马桥群众,“流言”自身易被夸大与界限不清的特质也被利用,以攻击身为“边缘”地方的马桥乡村之内更为边缘的生命。最后,马桥内外部森严的语言秩序也对个人的自我产生了压迫。在马桥有三类人没有“话份”,一是女人,二是年轻人,三是贫困户;而马桥面对“来自政治中心的声音”^[15]时同样也是失声的。“福柯认为,意识形态与语言之间是相互作用而非单向的关系。作为一种‘知识—权力’运行机制的意识形态,具有物质解构的能力,并通过将肉体驯服为生产力(劳动力)的方式(即以规训或惩罚的方式)建构主体。”^[16]因而,如村中的领导干部本义一般的人物则天然具有了话语权,便可以一面将自己视作村中的权力中心而耀武扬威,另一面又试图借此攫取自己的私利,在村中也能够同时占有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资源。

(二) 立场转换中的现代性启悟

马桥人无意识地习惯性世界的外围加筑了一道坚固的防线,一切外来的、异质的文明都要经过这条防线的辨识与洗礼,脱胎为独属于马桥思维的事

物,最终活在“醒”与“觉”中以作分辨,距离防线越近的个体便越会成为被排斥的对象,承担无法言说的痛苦。可以看到单纯作为旁观者的“我”对此也持否定态度。然而,正如法国学者贡巴尼翁曾言:“真正的反现代派同时也是现代派,今日和永远是现代派,或是违心的现代派。”^[17]在小说叙事者兼词典的编纂人“我”对自我之于马桥的叙事立场的变更中,马桥的反现代性在被重新演绎的过程中成为了抗拒语言、革命与政治暴力的武器,由此体现了“民间”特有的反思立场和作者探寻现代性的真正企图。

“韩少功骨子里是个‘知青作家’。不仅因为他有两篇作品直接影响知青文学发展,还由于他几乎全部的重要作品里,都有一个知青人物作为‘视角’存在。”^[18]从社会身份角度,《马桥词典》是在曾经身为知青而非马桥本地人的“我”的个人回忆中写成的小说,也是作者重构自我知青回忆的过程。此外,基于汪树东所提出的五种反现代性,小说鲜明地展现了韩少功文化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倾向。由此可以看到,经历了从“进入”到“离开”,于20世纪90年代重新归来的“我”之于马桥已然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外来者,如今的“我”与作为启蒙现代知识分子初入马桥的过往的“我”互为他者并实现了共存,由此实现了对自我的再启蒙,“我”得以兼有了反思和自省两种姿态,马桥对抗异质性文明的态度也能够作为一份清醒剂和永恒的象征物,以此警醒痴迷于追求虚假繁荣的世人。

一方面,“我”能够在个人记忆的回顾中感受到盐早送“我”离开时的那滴泪以及兆青在“我”不慎滑下梯子时的大哭与有毒瘴气的善意告知所传递的当时为“渠”,此时为“他”的温暖人情;同时一个个边缘之边缘生命缔造的传奇故事又证明了生命的韧性:正因意识到马桥对待女子的不公,大胆为自己寻魂并顺应身为一个女人正常的情感需求的铁香,才得以在文中展现自己鲜活的生命和传奇的一生;没有“龙”的万玉备受村里男人们的排挤,但他对女子和民间文艺觉歌的维护却感人至深。

另一方面,马桥人逆向化的语言思维中所潜藏的人性体认方式也提供了一条反向的思考路径。“我”认为,逆向语言中的反义“在自身内部生长和繁殖,浮现和泛滥,最后把自己消灭,完成对自己的否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词从一开始就是自己潜在的反义词,只是人们不大容易察觉”^{[8]147}。表面上一词兼有正反两义是马桥人词汇匮乏的表现,但却正因此揭露了语言主观性的灵活和潜在性,以及语言与广义的“人”结合后的无限可能。以“冤

头”一词的主人公盐早为例。盐早对性子古怪的祖娘用尽了心力,然而在村人眼中,却远不敌从未尽过孝道却在祖娘葬礼上悲痛大哭的盐午的“孝心”之盛,甚至还要受到众人以及盐午的指责。此刻盐早变成了最大的“冤头”。然而作者又借助“道学”一词贬义内涵的反面,以此展现盐早遭遇带给人们的启悟。“道学”在现代汉语的使用习惯中,常在前加一“假”字,本指某人表面正经但实则内心不纯,如《肥皂》中见孝女、买肥皂的四铭。但是在盐早之妻口中,给予钱财的“我”就是一个“道学”的人,这里的“道学”固然已被调换为褒义,指一个人讲礼性、讲德性,但语言的这种逆向使用却在此启发了作家:“马桥人用‘道学’一词取代‘善良’‘好心’‘热心肠’等等相近的词语,是不是因为无法摆脱对人性的深深质疑?”^[8]¹⁵⁸因此,一词正反义使用代表着人们看待人事的多重角度。村人只看到了盐午虚假的眼泪,却没有看到盐早日复一日照顾祖娘的负责与隐忍;“宝气”一词中因有一“宝”字,看似是对一个人的夸赞之语,实则却用于指代做事不懂变通的志煌。可就是这样的人却用尽一生忠于自己的岩匠职业,为此甚至敢于顶撞村中最具有话语权的本义,对其施以现代性的关照,志煌的钝感却是一种工匠精神的表现。《马桥词典》逆向语言的发展进程是对正向语言中所缺失或掩埋的内蕴的挖掘,也是“对普通化进程带来的暴力的抗拒”^[19],其中潜藏着作家对人性悖反之处的哀叹。

四、结语

《马桥词典》是韩少功在对边缘时空的探寻中挑战思想深度的一次相对成熟的实践。边缘化的马桥村整体是一个具备反现代性意义的寓言空间。但重估各类二元对立、单一的概念的最终目的,是寻找另一种属于中国的特有的现代性,即汪晖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中所提出的“中国现代性”。在《马桥词典》创作阶段,作者的寻找是失败的,但作者正视了自己的失败:一方面,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努力保持着一种理性的观察距离,但在论述至20世纪90年代与马桥后辈魁元的几次交往后,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解与厌恶情绪,使得作家对未曾经历现代化洗礼的淳朴乡情愈发眷恋;另一方面,魁元的结局也暗示了拒绝“同一性”同化的马桥无法抵挡一切现代化力量的侵袭,“元”“完”共体的静止日常终会被打破,对外部变化无知的马桥前代人甚至没有选择或拒绝现代性渗透的权力,所以陷入困顿的“我”在小说的结尾处不得不

“一步步走向陌生”。正如邓晓芒所言,作家在为马桥人不可理喻的言行举止进行辩护时,又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怀疑,留下了巨大的疑惑^[20]¹²³。因此,作者在“去中心化”的空间中找到了创作的兴趣所在。在此后直至21世纪,韩少功在持续关注乡村发展、刻画知青形象、保持理智思考的同时,对消费时代下的现代性、时间与空间以及丰富的人性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

参考文献:

- [1] 汪树东. 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反现代性书写[J]. 文艺评论, 2018(2): 62-75.
- [2] 逢增玉. 废名乡土小说隐含的反现代性主题及其叙事策略[J]. 东北师大学报, 1999(3): 31-35.
- [3] 费团结. 文学地理景观中的现代性或反现代性意识形态[J].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36(5): 61-65.
- [4] 张未民. 当代的意义: “当代文学版”发刊词[J]. 文艺争鸣, 2007(2): 1-3.
- [5] 陈晓明. 表意的焦虑: 历史的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 [6] 王洪岳. 论别现代与元现代[J]. 甘肃社会科学, 2023(4): 75-84.
- [7] 韩少功. 马桥词典[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8]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夏露,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90.
- [9]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 译.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 287.
- [10] 泰勒. 原始文化[M]. 连树生,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276.
- [11] 靳凤林. 论中国鬼文化的成因、特征及其社会作用[J]. 中州学刊, 1995(1): 124-128, 87.
- [12] 刘再复. 罪与文学[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1: 38-39.
- [13] 梁小娟. 汨罗: 韩少功的精神原乡[J]. 江汉论坛, 2020(12): 60-66.
- [14] 黄晓燕. 地方性叙事与记忆共同体的构建: 以《马桥词典》与《押沙龙, 押沙龙!》为例[J]. 中国文学研究, 2022(2): 197-203.
- [15] 南帆. 马桥词典: 敞开和囚禁[J]. 当代作家评论, 1996(5): 4-10.
- [16] 张秀琴, 孔伟. 福柯的意识形态论: “话语—权力”及其“身体—主体”[J]. 国外理论动态, 2016(7): 15-26.
- [17] 贡巴尼翁. 反现代派[M]. 郭宏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2-6.
- [18] 许子东. 当代小说阅读笔记[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113.
- [19] 孔见. 韩少功评传[M].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 136-137.
- [20] 邓晓芒. 灵魂之旅[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责任编辑 游 曼]